

农民工人力资本 水平及其代际转移研究

侯晓娜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第 2 章 相关概念及基本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2 基本理论

第 3 章 农民工个体特征与人力资本代际差异

- 3.1 农民工个体特征代际差异
- 3.2 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差异

第 4 章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测算

- 4.1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模型
- 4.2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测算结果

第 5 章 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机理及实证分析

- 5.1 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机理

5.2 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实证分析

第6章 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及其代际转移效应

6.1 乡城迁移效应

6.2 劳动就业效应

6.3 资本累积效应

6.4 认知更新效应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研究结论

7.2 政策建议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第1章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水平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前只有 17.9%，然而到 2008 年，这一数字已经变成 45.7%，而且，这种城市化进程正呈现加速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得知，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达到 49.8%。根据 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数据，2011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已经达到 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中国人在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职业结构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国外的城市化通常都是迁移人口从迁出地迁出与转入到迁入地两个过程同时完成。而在中国，这两个过程并没有同时完成，而是迁移人口从迁出地迁出而没有在迁入地直接定居，这部分迁移人口成为了农民工，即成为了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的尴尬群体。他们大部分人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短期迁徙，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实质低于 50% 的统计水平，被学者称为伪城市化（翟振武，2012）和半城市化（王桂新，2008），并且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与工业化同步进行，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社会群体已经不再是同质的群体，内部出现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 80 年

代后生人,有的是追随父母到城市打工,有的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缺乏甚至没有务农经验,他们对生活要求高,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明显的不同。随着老一代农民工渐渐的老去,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也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在城市化进程中,两代(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未来城市化质量和水平。本文通过对两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研究和测算以及比较两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代际间的差异,探索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的条件及影响因素,分析出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的机理和效应,为制定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

1.1.2 研究意义

一代农民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力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正是这一力量的新引擎。测算两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分析人力资本在代际间如何转移是一个难以科学度量的复杂理论与实证问题,涉及到人力资本指标体系构建、人力资本水平测算以及代际转移机制分析等多项内容的研究与思考。这一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经济、社会价值。

1.1.2.1 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 30 年来,城市化进程开始呈加速趋势,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化进程和质量的大问题。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提高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背景下,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中国最终将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从人口优势向人力资源优势转变的目标。因此,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并促进其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1.1.2.2 理论意义

众多经济学家已经明确指出,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之一,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人力资本投资会产生一定的外部效应,与物质资本投资相比,能够获得更多的回报。而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了决定城市化进程及质量的重要因素。本文力图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测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分析代际差异及转移机制,因此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1.1.2.3 应用意义

目前关于研究农民工人力资本这一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两代间农民工人力资本的代际转移研究比较少见,因而本文的研究为如何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人力资本代际间的转移提供新思路,为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质量提高的新动力找出途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1.2.1 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内对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2.1.1 关于农民工概念界定的研究

第1,关于一代农民工概念界定的研究。1984年,张雨林教授在《社会学通讯》上第一次提出“农民工”的概念,之后农民工的概念被学界逐渐而广泛的应用。文军、朱士群(2000)认为农民工应是从农民分化出来的“农民身份的工人”,即他们的户口仍然是农业户口,身份还是农民的工人。陆学艺(2002)认为农民工是指在国有、集体单位工作的,有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朱信凯(2005)认为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韩长赋(2006)指出农民工是指家有承包土地,户籍身份还是农民,却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员。宗成峰、朱启臻(2007)认为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传统户籍制度产生冲突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认为农

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特殊概念，户籍依旧是农业户口，拥有承包经营土地，但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力。早在1996年，李培林从农民工层次分化角度，认为按农民工拥有的资本和雇佣方式不同，可被分成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完全依赖打工获取工资收入的劳动者、占有少量资本的个体户和占有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唐灿，冯小双（2004）认为农民工群体发生了内部质的变化，他们通过对北京“河南村”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经济收入、资本占有、消费行为、社会声望等方面，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和等级。这些学者所定义的“农民工”是一代农民工，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城市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这使得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离开了土地，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成了老一代农民工，即本文所指的一代农民工。为了方便比较，本文把新生代农民工称为二代农民工。

第二，关于二代农民工概念界定的研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代农民工渐渐老去，而他们的子辈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的核心力量。国务院研究室在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正式确认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王春光（2001）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指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的年龄一般在25岁以下。廖海敏（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受过初高中和中专教育的、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刘传江（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较小的亚群体。韩俊（2009）界定新生代农民工为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28周岁之间、1990年前后接受基本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王宗萍等（2010）从人口学角度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主要在城镇务工的、仍然保留农村户籍的新一代农民工。

第三，关于二代农民工自身特征的研究。王春光（2001）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一代农民工和传统农民有着较大的不同，他们不太认同农村的生活方式，反而开始认同城市、并积极的融入城市的生活，他们对乡土的认同主要是基于对亲人的眷恋。他们缺乏务农的经验，不愿意从事农村的生产活动，对农村传统或封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持否定态度。他们有着年轻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一些社会特征。翟同宪（2009）发现女性的新生代农民工

对生活的期望相对较小,对现实生活相对满意,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悲观和不满情绪,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有着较好的打算和更多的期待。吴漾(2009)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程度好于老一代农民工,因此在城市更加自信,能够用积极的态度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同时消费观念接近市民,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丁志宏(2009)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包括年龄、规模等,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较小、规模较大,主要是80年代后生人,大多处于未婚状态,受教育程度较高,并且性别比例的差距越来越小。新生代农民工流出地主要是中部地区,流入地主要是沿海发达省份。杨春华(2010)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生存当作城市打工的第一要务,对工作的期许也发生了较大转变,不再单纯关注工资的多少,而开始着重关注自身的发展前景。杨梅(2010)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注重自身的培训学习,强调运用法律的维权意识,愿意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关注自己的身份变化。在心理特征方面,徐丹(2008)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不同于一代农民工的“排异心理”,而这种心理特征的出现是在城市打工中的职业身份造成的。韩雪松(2009)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被剥夺感增强,对社会有着较大的不满情绪,他们有时会自卑和情绪低落。刘闻佳(2010)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表现为自我意识增强,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但同时心理又较为脆弱,有时缺乏信心和城市归属感。在幸福的追求方面,王焕举(2010)研究发现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幸福需要自身的努力,只有坚持不懈的奋斗和拼搏才能在城市获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功,他们肯定劳动对幸福和成功的价值。

1.2.1.2 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研究

第一,关于一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研究。

①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概念的研究。阮晓莺(2005)研究认为,农民工是拥有人力资本的,并且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是运用教育、健康和技能培训等方式形成的在农民工身上的存量。石晶梅(2007)的研究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是农村人口或流动人口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通过教育、技能以及健康等能够提高农村人口劳动力效率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能力,这种能力即称之为

人力资本。王艳华（2007）研究认为农民工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即在农村所受的正规教育；其次是农民工的身体素质，包括健康、营养投资等方面；第三就是农民工的培训情况，包括技能、科技、职业等培训。

②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国内很多学者主要集中在农民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以及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的障碍分析等方面。石晶梅（2006）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的经济增长开始越来越少的依赖物质资本，逐渐开始转向依赖人力资本。如果农民人力资本能够得到提升，对于农村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促进作用。曾一昕（2007）指出在现行经济条件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逐渐得到社会的欢迎，但即使这部分农民工人力资本提高也不能完全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周文英（2007）从培训的角度研究了农民工在进行培训时存在的风险，她认为社会和企业对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投资还是十分的有限，应该加大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保障农民工人力资本有提升的空间。

③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集中在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存量等方面对于农民工非农收入的影响。周春芳（2005）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工人力资本对于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的因素包括受教育年限、技能培训以及城市工作时间。乐章，刘莘莘（2007）通过对湖北省农民工的实际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培训经历、文化程度、打工与迁移对于收入的影响都较为明显，并且发现以上几种途径对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④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模型构建的实证研究。国内一些学者通过模型构建对人力资本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武向荣（2009）用明瑟方程式及其扩展式计算了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结果发现，农民工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民教育收益率，但低于城市职工教育收益率。跨省流动以及在劳动力市场比较完善的行业和地区从事比较稳定工作的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较高。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对收入贡献很显著，并且农民工高于城市职工的培训收益率。叶静怡，周晔馨（2010）通过对2007年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收入的高低受人力资本的影响，但受原始社会资本的大小影响并不显著，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即新型社会资本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农民

工社会资本转变不仅关系自身收入提高和福利增加,而且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伍振军,崔传义(2010)基于对2007年的调查数据,通过运用明瑟模型对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和返乡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进行估算,并得出了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时,其人力资本被广泛低估,而返乡能够得到补偿的结论。王子,叶静怡(2009)从人力资本形成效率的视角研究农民工工资与其工作经验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简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之后,发现工资随经验上涨,以及培训对经验的工资回报有显著作用,并且发现随经验增长的农民工工资速度呈递减的上升态势,接受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工资增速较快。刘林平(2007)通过实地调研,通过构建模型得出结论: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培训、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工资越高,工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黄乾(2010)根据城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工作转换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无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的工作转换对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均有显著的影响。高人力资本、高收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行业间工作转换,低人力资本、低收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行业内工作转换。

第二,关于二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辜胜阻(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或者称第二代农民工正成长壮大,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是“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成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郭根山,刘玉萍(200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好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是他们接受的技能培训机会比较少,在城市打工过程中不能完全适应企业的需要,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学习职业技能对于提升人力资本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何小红(2010)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很多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这更需要他们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发生转换,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彻底转变。同时,也有少量学者对农民工人力资本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魏敏(2005)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与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得出应重视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问题,由于文章发表较早,尚未涉及“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俞玲(2010)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和收入的角度进行相关的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层

次低、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与其人力资本水平低密不可分。与城市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明显的人力资本劣势。刘万云（2011）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做了系统的研究，把农民工人力资本分为三大维度，并且在三大维度的基础上，总结了能够衡量人力资本的7项指标，并且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总结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六大特点。申朋，申有明（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之间有较大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具具有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投资性、时代性、持续性和脆弱性的特点。惠源（2010）通过对典型数据的分析，测量了年龄、教育、经验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劳动收入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发现第二代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受文化程度和性别差异的影响显著，年龄、就业方式、工作性质等因素也成为影响因素，但影响的结果并不稳定，并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第二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就业扶持等对策性思考。

1.2.1.3 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问题的相关研究

第一，关于农民工代际差异的相关研究。王东、秦伟（2002）利用实际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群体中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流动动机和目的、收入、消费、对城市的适应性、对家乡的回归性等几个方面存在着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群体中确已发生了代际的分化。代际分化的主要特征是年龄、初次流动年代、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王春光（2001）的研究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他们不仅在流动动机上存在的差别很大，而且在许多社会特征上也表现出很不一致的特点。王晶（2008）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自身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代际转换问题。第二、三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流动动机、流动地、流动的组织性、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从事的职业结构、从事的行业结构、对城市的认同度及向农村回流趋势方面都有显著不同，应正确认识农民工代际间的差异，做好相应的解决措施。刘彩云，黄国清（2012）通过实证的角度出发，分析出两代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动因、身份认同、与农业的联系、就业途径、消费情况、市民化意愿、未来打算等方面均

存在较大的差异,并得出结论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都具有较大的优势,包括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动机和意愿也十分强烈。吴焱军(2012)通过对两代农民工在自身特点、消费行为、城市融入、价值观念方面存在代际差异的基础上,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受农村形成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较大,对于城市融入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第二代农民工年纪轻,缺少甚至没有务农经验,从学校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城市打工,对于城市人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接受的比较快,更能在更短时间融入城市生活。陈旭峰,钱民辉(2012)从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社会融入是如何影响农民工在社区的参与程度,同时探讨这种影响在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性,并提出解决对策。杜书云,张广宇(2007)认为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农民工代际之间在移居城市动机、在外就业、务农意识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比例发生较大变化,调查数据显示女工比例甚至超过男工。刘志英,刘超(2011)认为两代农民工存在文化、就业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根据代际差异,构建两代农民工流动影响社会养老保险的“城乡水池”模型,从人口、就业、基础养老金发放、新农保建设、养老保险关系接续、城乡统筹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

第二,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本代际转移的相关研究。陈如(2009)在分析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就业的代际分流机制,主要为回流、截流和畅流机制。陈如认为农民工的就业取向不同,三种代际分流机制是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吴焱军,林李月等(2012)基于2009年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对两代农民工的劳动福利分析发现二代农民工福利状况总体上优于第一代,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两代农民工福利获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表明企业特征对二者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社会资本更多的是对第一代农民工产生影响,文化程度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更深刻。刘凤香(2013)认为工作场所代际差异现象增加了组织管理的复杂性,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工作价值观代际差异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侯佳伟,窦东徽(2012)认为第一代流动人口比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禀赋效应感更强。与第一代相比较,第二代流动人口中的雇员所期望的薪金更接近于雇主所愿意购买的价格。田艳平(2013)认为两代农民工无论是初次职业选

择还是现职业选择,其职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目标和职业诉求、职业稳定性乃至当前工作条件、月均收入等方面都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李庆(2009)认为农民工的弱势地位和保障缺失正在进行着代际转移,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在城市里很难享受到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因此在他们失业之后,很容易沦落为城市的弱势群体,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改变。徐文婷,张广胜(2011)基于2009年沈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研究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因素,比较分析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决定的影响因素和程度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是否接受职业技术培训、受教育程度、性别和职业类型是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拥有技术或手艺成为新老两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三,关于人力资本及其他代际转移的相关研究。谢勇(2006)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或者人力资本投资支出过高,父辈间的收入差异或不平等,会导致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状况的差异,从而导致子女收入也出现不平等或差异的现象,使得收入不平等存在代际间传递的现象。陈琳,袁志刚(2012)认为父代可以有两种方法提高子代收入水平,一种是对子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提高子代人力资本水平;另外一种是通过权力寻租和积累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直接提高子代的收入水平。这两种途径对于提高子代的收入水平都有积极的影响,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却是不同的。李昕(2011)认为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同时在经济机会、社会安全、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等方面构建创新的体制,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段慧丹(2012)认为城市贫困问题凸显,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特征,并分析出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包括先赋性因素、自致性因素与社会条件。王青,胡颖森(2011)通过对父子收入代际弹性和家庭收入代际弹性的研究,发现子女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到父亲收入或家庭收入的影响,证明了中国居民收入代际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特别是低收入群体。通过内外因分析,教育作为第一大因素显著的影响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的情况。同时认为

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个人教育水平提高和教育环境的公平可以使低收入群体有机会流向更高收入阶层。韩春（2010）认为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应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1.2.2 国外研究现状

1.2.2.1 关于城市化的研究

第一，关于城市化定义的相关研究。国外对城市化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城市化定义很早就出现在一些国家的百科全书中。《苏联百科全书》记录着城市化的定义，认为城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事件，并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过程，城市化影响着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日本百科全书》也记录了城市化的定义，并把城市化定义为城市人口数量急剧扩大的过程。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城市化是指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城镇的数目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城市的人口急剧加大。国外学者对城市化的含义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美国布赖恩·贝利（Brian J. L. Berry）在1973年的代表作《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比较城市化：20世纪多元化道路》）中，布赖恩·贝利对各国的城市化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在各国的城市化中，城市化道路、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结果都不尽相同。英国帕乔内（Pacione, 2003）将城市化从三方面进行理解：首先城市化体现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其次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第三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过程中得到迅速的扩张和蔓延。日本学者森川洋（1989）主要是从生活方式的转变方面进行研究的，认为城市化主要是农村人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并且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城市人口逐渐扩张、城市数目增多、城市景观环境的逐渐形成。美国弗里德曼（Friedman, 1966）对城市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城市化是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并且区分了城市化过程和城市化进程的不同。

第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威廉·配第在1691年就明

确指出,工业要比农业所赚取的利润高得多,因此威廉·配第断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必将转向工业。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40)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认为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收入在产业间存在差异。唐纳德·博格(1950s)系统的研究了人口迁移的动因,明确指出人口迁移主要是由于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即推力和拉力。推力是指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失业的形成和较低的收入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出农村。拉力是指在城市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收入水平,并且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对于迁移人口有天然吸引的拉力。

刘易斯(1954)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模型。他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劳动力具有无限弹性,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会获得无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他指出,农村逐渐摆脱剩余劳动力的负担和低效率,开始真正发展。尼斯—费景汉(1961),对刘易斯模型的不足进行修正和扩展,论文《经济发展理论》即为两人的合著,在此文中提出拉尼斯—费景汉的人口流动模型,1964年又进行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临界最小努力”的概念和准则,从而扩大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乔根森(1967)认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当农业的需求被满足时,劳动力就会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人口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人口。

1.2.2.2 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

斯密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思想,1776年在出版的《国富论》中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的才能”视为“固定资本”。他说:“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一样看作为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欧文·费雪在1906年提出,只要能够带来收入和利润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资本,并且资本的价值是未来预期的折现值。这一论述说明人的活动是可以带来收入和利润的,人的活动即可称作为资本。西奥多·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先行者,并且正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西奥多·舒尔茨1960年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同年在《改造传统

农业》一书中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从此，学术界对人力资本才开始给予极大的重视。西奥多·舒尔茨还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来解释劳动，并且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论述，解释了当时很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且提出了“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的论断。他还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迁移行为，认为人口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体现，只要迁移的预期收益大于迁移成本，即可发生人口迁移。贝克尔也是公认的人力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之一，1964年，他在《人力资本》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并详细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内涵、特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内涵中不仅包括知识、技能和才干，还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同时，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其中用于增加人的能力并提高其收入的投资均是人力资本投资。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思想被称作为人力资本投资革命的起点。保罗·罗默（1986）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著名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且提出了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源泉。20世纪90年代对模型进行了改进，把人力资本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内，明确指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1988）在《经济增长的机制》论文中分析了整个经济中人力资本的形成、积累对产出的贡献，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模型，并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

1.2.2.3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及人力资本的相关研究

Oded Stark（1996）等对中国农民工迁移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且着重研究了农民工回流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认为出现回流的重要原因是现行的处于改革之中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Kam Wing Chang等（2000）认为，制约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也是传统户籍制度，并且把很多农民工的问题归结于传统户籍制度的存在。他们认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是进展最小的改革之一。Rozelle Scott等（1999）发现迁移对家庭农业生产的影响是两面的。一方面，迁移减少了家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当一个家庭成员迁移出去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时，产出急剧下降，因